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九二期 ——
(二〇〇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205d)

| | | |
|--------|-------------------|-----|
| 【亡灵祭坛】 | 回国留学生萧光琰一家之死 | 宁连乔 |
| 【亡灵祭坛】 | 一封等待了两年的信 | 王友琴 |
| 【劫后反思】 | 我们敢不敢直面历史 | 徐友渔 |
| 【劫后反思】 | 博物馆与真实记忆 | 徐友渔 |
| 【研究动态】 | 社会史视野下的“文革”研究 | |
| | ——徐有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简介 | 董国强 |
| 【研究动态】 | 读徐友渔文革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 | 胡平 |
| 【往事追忆】 | 红卫兵小报和我(十一) | 周孜仁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亡灵祭坛】

回国留学生萧光琰一家之死

• 宁连乔 •

萧光琰是福建省福州市人，一九二〇年生于日本，后移居美国。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一九四六年任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助理研究员。一九四七年任芝加哥大学冶金研究所研究员、一九四七年八月任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化学师。

一九四九年秋天，他产生了回到祖国的愿望，决心为祖国的石油工业搞到一批技术资料，他购买了翻印器材，搜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赞同他，协助他，并和他怀有同样心情的人，还有他新婚的妻子甄素辉。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萧光琰向他久居的美国告别，转道香港，投入了祖国的怀抱。按他的意愿，安排他在石油部做研究工作。后来，他到了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组织上派专人放大、

整理，鉴定了他带回来的材料，认为这些资料有价值，将会对我国的石油炼制工业起到有益的作用。

他回国不到九个月的时候，“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他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人们追问他“回国的动机是什么？”他只能呆呆地忍受了“思想反动”、“有卖国思想”、“带回资料是为了向上爬”、“十足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评价。他伤心极了，他只能向家属亲人倾诉：“我爱（共产）党冒险回国，谁知（共产）党不爱我，把我关在门外……对新中国，我有“失恋”的感觉，感到生活失去了重心和平衡。我感到前途悲观。”从此，他患了严重的失眠症，长期不能工作。

一九五六年，有关部门的领导检查了过去一段时间里对知识分子的错误做法，亲自找萧光琰谈话，向他表示歉意，修改了一份他有很大意见的鉴定材料。他真诚地把前一段不愉快的生活当作“误会”，怨气全消了。他甚至责怪自己，不该灰心，误了工作。他向共产党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弥补过去五年无成果的损失。”要“长期努力，争取入（共产）党”。从此，他拼命地工作。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所领导的专题小组完成了十五篇论文报告，他回国后一直从事的“页岩油催化裂化及其氮中毒的机理研究”和“电子酸性催化剂研究”，在应用的基础理论方面，都有了进展和突破。“页岩油催化裂化”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探求以页岩油为原料，制取优质油（包括机油）的途径。五十年代的我国，在这方面还处于空白状态。萧光琰沉浸在工作成果带来的欣慰之中，他把这段时间叫做他生命的“黄金时代”。

一九五八年底，他被定为“白旗”，放在被“拔”的位置上了。“老白旗—萧光琰”的大字报贴满了走廊：

“你对祖国毫无感情……”

“你带了点破资料是为了往上爬……”

“你拿了高额工资，几年来没有任何成果……你执行的是挂羊头卖狗肉，唯有理论高的白旗路线……”

“你想入（共产）党，这是对共产党的污蔑……”

除夕联欢会上，在人们的欢笑声中，他听到报幕员高声宣布“活报剧《洋博士现形记》开始”。于是，大幕拉开，在小锣声中，一个按他的特征化装成的小丑出场了。“小丑”自报说：“在下萧博士，靠父母的造孽钱，在美国混了个洋博士，听说共产党在中国掌权，待我偷点资料，混进中国，也好捞个一官半职……”

他怀着一颗愿意“改造”的心向领导倾诉：“像我这样背景的人，这样改造方法不一定最有效，如人格被伤了，改造就慢了。”他天真地思想，这样做，工作没法进行。没料到他的专题长被撤掉，改由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他被“另行分配”了。

一九六一年，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再度纠偏，他像孩子一样兴奋地向共产党、向亲人们表示“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希望再活四十年”。这段时间里，他游泳、打球，失眠症竟然好了。他领导的专题组完成了十六篇论文报告，专题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他还主动兼任青岛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提出了具有方向性的研究课题——生物催化。

文革一开始，他就受到了冲击和批判。

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晚九时，化学物理所的工宣队派出专政队，把正在病中的萧光琰抓进“牛棚”。同时，抄收萧家一切值钱的财物。

严厉的、无休止的“审讯”开始了。

“萧光琰，你在美国挣那么多钱，生活那么好，为啥回来？”

“你能把美国的资料弄到中国来，一定也能把中国的资料弄到美国去，你老实交待，为美帝国主义搞了多少情报？”

仍然是十八年前的老问题。“专政队”对他的待遇已不再只是怀疑和控制，而是用“三角带”特制的刑具猛力抽打，他只能用惨叫来应合人们的嘲骂了。

“专政队”的一个工人暴徒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屎”。因为旅大人把“白”念成和“博”同音，于是当年的博士终于演化成为“白屎”，任人践踏。他在斥骂声中，被迫写下了二十六份“交待材料”。当然，每交上一份得到的是一阵斥责，以至“抽你的筋，剥你的皮”的威吓。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六日，在他挨过一顿皮鞭抽打之后，精神特别坏。“放风”时，他用微弱的声音，喃喃自语：“共产党的政策是会给出路的……”此时，他已经把平生希望缩到最少的限度只求给出路了。

十二月十日晚，又一次严厉的“审讯”和更凶暴无情的皮鞭抽打。

十二月十一日晨，当“专政队员”厉声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时，萧光琰再也不会爬起来，他死了。验尸结果：服过量安眠药一巴比妥自杀。“专政队”认定：反革命特务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并贴出了“特大喜讯”晓喻全院，决定“乘胜前进，深挖一切阶级敌人”。

当天下午就把萧光琰的妻子，正在营城子农场劳动改造的海运学院英语教师，中国血统美籍华人甄素辉拉到化学物理所，向她严肃地宣布：“反革命特务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他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你要继续交待。”

甄素辉没有表示她将怎样继续交待，也没有哭，只是向丈夫的尸体看了一眼，请求准许她请两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见的孩子，甄素辉的请求被批准。她当天就回家了。

萧光琰和甄素辉的十五岁的女儿小络连在父母被揪斗后，在嘲骂、追打中过著痛苦的孤独生活。人们无从知道甄素辉母女相见的情景。第三天(十二月十三日)，一直不见这家人的任何动静，敲门也不应。把门弄开，看到的是：母女双双躺在双人床上，盖著被，母亲紧紧地搂著女儿，他们早已停止了呼吸。经检验，认定是服过量巴比妥致死，当然又是自杀，他们随萧光琰一同而去！

自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萧光琰一家三口，相继自杀身亡。当时，对于萧光琰和甄素辉，人们当然不肯也不敢说一句表示怜悯的话，因为他们是从国外回来的呀，谁知是什么人呢？

三天之内，死了全家，成为“专政队”和一些人的“辉煌战果”，向上级报功，并决定“继续深挖”，由大连化学物理所，大连海运学院，大连运输公司、大连妇产医院组成了联合专案组，并命名编号，把以萧光琰为中心的(三〇一)特务集团案列为重点大案，进行紧张的内查外调，株连所及达十一个单位二十六人，其中当然包括照顾过小络连的老邻居夫妇，曾和萧光琰交换过热带鱼的老理发员，以至给萧博士打过针的护士，等等。当然，他们又说这是“清队的重大

收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可惜的是，任你怎样“政策攻心”棍棒启口，硬是搞不到一点像样的证据。所以，“三〇一”一案实质上毫无结果，以至不了了之。然而“专政队”及其指使人支持者的“功劳”却不减。因为不管是真是假，是有是无，只要“挖出”了特务集团，就是“特大胜利”。大连化学物理所已经得到“上级”的重视，不久，他们就成毛远新亲自抓的“典型”，做为“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活样板，把他们的“经验”赫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 摘自《共和国档案记录》，文章有删节。

~~~~~

## 【亡灵祭坛】

一封等待了两年的信

• 王友琴 •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收集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1998年，我给一位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打电话，他说他自己的故事将来再写，他要先写关于别的受难者的故事，并希望我作些文字方面的帮助。不久我就收到了他寄来一篇文章，题为《医学教授娄瘦萍》，文字流畅通顺，并不需要修改或润色。我把文章寄给编辑苏晓康先生，他在《民主中国》1999年第四期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后来，网络杂志《华夏文摘》的“文革增刊”转载了这篇文章，是在1999年的增刊zk9911c上。

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文革中是个青年学生，以“反革命罪”被判刑，抓进了监狱。在劳改营里，他认识了娄瘦萍先生。娄瘦萍是医学院的教授，当时已经是67岁的老人，因“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恶劣的营养条件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心理的折磨，关在劳改营四年以后，他在那里死亡。他的“反革命罪”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的妻舅和女儿试图偷越国境逃离文革，而他则被当作支持他们“叛国投敌”的同盟者，被处以15年重刑。

◇ 受害者依然隐名埋姓

这篇文章真切感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记载了完全真实的事情，包括作者自己的身份和遭遇。但是文章署名“江雁”，却不是作者的真实姓名，其实也不可以算是个所谓“笔名”，因为这个作者并非常写文章的人，只因他不愿意使用真名，就起了一个别名，这是非常令人感慨的。

我收集文革材料的时候，遇到了相当多这样的事情。毛泽东已经死了25年，文革也已经结束了25年，但是今日的现实却是：那些当年整人打人害人的人，在这世界上毫无羞愧地生活着，有的还理直气壮地赞赏自己的过去，甚至还指责那些站出来揭示真相的人是“造谣诽谤”；而受害者却相反，他们虽然得到了所谓“平反”，有的也有了相当不错的生活，但是大多数受害者却采取低调，很少说出他们的遭遇和痛苦。结果，文革只有在小说里是痛苦、黑暗、错误，而人们叙述的关于他们的真实经历，却没有被记录，以致有人断言文革的痛苦和不幸是编造渲染出来的。

为什么受难者不能用真实姓名公布他们的真实经历？在记录文革的事实的同时，我有时也思考这原因。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这首先是因为在整体的社会气氛中，在公众的集体记忆中，文革并未被认为是一种“罪恶”，也没有被真正记录和清算。文革只被中国人界定为“毛泽东的一个错误”，而毛泽东依然是权力者规定人们必须接受的偶像。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被害者继续处于弱势之中。

我听说，我写的另一位受害者的孙子，因为年纪还小，一直不了解当年爷爷为什么被打死，读了我写的他爷爷的故事之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会不会再来打我和妹妹？”事情过去30多年了，中国的年轻一代所能关注的，依然不可能是向凶手索取社会正义，而是继续担心自己受害。文革在现实生活和在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双重阴影，都十分深重。

也许，跟文革中真实的杀戮、恐怖相比较，这种不能说出事实的压抑气氛，已经算不了什么，所以经历了文革的很多人也就忍受着这种压抑。其实，如果细想这种压抑，是依然令人心生痛楚的。

我非常理解“江雁”不使用真名字的苦衷。受害者无权无势，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故事，不但无损于当年的作恶者，反而在权势者面前暴露自己，只可能带来麻烦。受害者只有尽量避免被公众注意。把一个无声无息地死在劳改营里的萍水相逢者的故事，铭记在心，并且书写出来，是一种高尚的行为，然而高尚的书写者却要在现实中把他的名字掩藏起来！

然而，“江雁”只是在劳改营里遇到了娄瘦萍，目击其生命最后几年的遭遇，劳改营不准许“犯人”们交谈他们的“案情”，对受害者们分而治之，是劳改营内外都普遍使用的手段，所以要了解娄瘦萍的完整故事，还需要找到他入狱前的相识者。

另外，“江雁”和我都非常想知道娄瘦萍的女儿后来的命运。娄瘦萍已经死亡，他的女儿年轻得多，她被判刑10年，只要她能熬到刑满后出狱，就一定还在人世。所以，在“江雁”的文章被放上网络之后，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网路读者中，也许会出现认识娄瘦萍和他女儿的人——读者中会有他的学生和同事，也可能有他们的亲属、邻居和相识的人。他们不会全然忘却这父女两人。他们中间还会出现“江雁”这样的人。他们的记忆和良心不会让娄瘦萍和其家人就这样无影无踪地消失在历史中。我心里期待着，有一天，会有人送电子信或者普通的信件来，告诉我关于娄瘦萍和他的女儿的比较完整的情况，虽然我并无把握。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终于收到了这样的信。并且，我也得到机会和写信者谈话。

电磁波在一秒钟里可以环绕地球表面走七圈半，网上的文章在不到一秒钟内就可以传遍全球，但是，《民主中国》和《华夏文摘》这两个网路杂志都是被网上“防火墙”拦截的，也就是说，国内的普通人无法在网上读到这两个杂志。所以，虽然关于娄瘦萍的文章早在1999年就已经被放在网络上，实际上这篇文章却是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路，经过了在几个国家居住的中国人的手，才传送到国内；后来，回信又几经周折，辗转到了我的电脑屏幕上。这中间竟然用去了两年的时间。关于娄瘦萍的文章和其回应信件的传递经过，构成了另一个漫长而又令人难过的故事。我深深感谢每一个中间的传递者，也为在有了“信息高速公路”的时代有这样缓慢的信息传递而感叹。

#### ◇ 逃亡是死罪

娄瘦萍生于1904年。小时候家境贫困，求学的路也比较曲折。1938年他毕业于湘雅医学院，这是美国耶鲁大学在中国创办的最早一所现代化医学院，对学生有相当系统和严格的训练，学生在湘雅医学院要学习七年才毕业。娄瘦萍毕业后，当了外科医生，曾经在长沙医院担任院长。1949年后，他在湘雅医学院担任解剖学教授。他不是一个喜欢参加政治活动的人，没有参加任何党派。

1957年，娄瘦萍被划成“右派份子”。当时，娄瘦萍其实并没有听信当局的谎言来“帮助党整风”、“给党提意见”，他谨慎小心，甚至可以说胆小怕事。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号召人们“大鸣大放”，批评共产党，娄瘦萍却告诉别人说，不能这样作，不要乱说话。他写了一首打油诗给朋友，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瓜田李下，不敢多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样的意思很清楚，是不发言、不“提意见”。但是，后来这首打油诗被交给单位领导，反而成为娄瘦萍被划成“右派份子”的“证据”。那些领导“反右派运动”的人说，你不是说“非我族类”吗？你当然是“右派份子”。

据文革后给“右派份子”“改正”的一份材料说，在湖南省，在1979年8月，还活着的“右派份子”有三万一千人，这个已经非常巨大的数字，还没有计算从1957年到1979年的22年间病故、自杀、被杀害的“右派份子”，其间就包括长达十年的文革。娄瘦萍就是湖南省被划成“右派份子”的巨大人口数字中间的一个人。至于领导了湖南省“反右派运动”的中共省委书记周小舟，两年之后，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等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

娄瘦萍被划成“右派份子”以后，降薪降级，调到衡阳医学院。这在对“右派份子”的惩罚中，还不算严厉的，但却剥夺了他为病人服务的机会。实际上，按照人口比例，中国严重缺乏医生，特别是缺乏受过良好训练的医生，迫害医生，实际上是伤害大量病人；剥夺医生的工作和生活权利，实际上是剥夺病人的生存机会。但是，当时的政权显然不在乎普通人对医生的需要和依赖，也就是说不在乎普通人的死活。在“反右派运动”和文革中，把一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为人治病的医生当作“阶级敌人”横加迫害严厉处罚，是毛泽东无人性无理性的作为之一。

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写有一批文革中受难的医生的名字和故事。在中国民间普遍流传的《三国演义》里，曹操杀害了医生华佗，那是被当作遗臭万年的恶行来描写的。大批医生在文革中和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而死，他们的死亡和不幸却几乎未被记载，更没有得到应有的道义谴责。

后来衡阳医学院解散，娄瘦萍被调到湖南中医学院，在那里教授解剖学。

娄瘦萍的妻子有个哥哥叫韩国远。韩国远也是医生，1950年四川华西医科大学毕业，学的是牙医。这所大学要读八年，和湘雅医学院一样，是一所西方风格的现代医学院。1949年，有人劝韩国远去香港，但他考虑到已经读了7年医学院，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实在舍不得自己的学位；另外，大概他觉得牙科医生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不管什么社会制度，总需要牙医的。这是很自然的想法。

韩国远从医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贵阳中央铝业公司。他在学校就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工作一年以后评级，由于他工作出色，比同届的同学还评高了一级，在1951年“政治条件”还不象后来那样被看重。韩国远没有结婚，亲属中只有一个妹妹，就是娄瘦萍的妻子。

文革一开始，娄瘦萍是“右派份子”加上“反动学术权威”，在湖南中医学院里遭到“批判斗争”。韩国远在贵阳铝业公司，也成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斗争”。

我们现在还不了解当时韩国远遭受到什么样的虐待和折磨，因为还没有找到韩国远当时在贵阳的相识者，但是当时的贵阳已经十分暴力化，是很清楚的。据一位当时住在贵阳的被访者说，北京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在1966年夏天到达贵阳，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清华附

中红卫兵曾经到贵州省文化局打了很多人的，其中有文化局所属的京剧团的演员。贵州文化局当时的幼儿园的院长，一位中年妇女、四个孩子的母亲，并不是文革的主要打击目标，也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剃了“阴阳头”，用铜头皮带抽打，以致满背都是青紫血痕，惨不忍睹，一位被访者说，她看到了这位幼儿园院长被打后的后背，她从来没有想象到过人类的皮肤可以被打成那样可怕的颜色，所以印象深刻，永不能忘。从1966年8月到年底，文革领导人给予红卫兵免费火车票和食宿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实际上是把北京在1966年的所谓“红八月”中的打人和杀戮之风带到全国，在全国各地对所谓“牛鬼蛇神”开展暴力性攻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远1967年逃离贵阳，来到长沙妹妹家。

韩国远来到长沙，长沙妹妹家的情况也一样糟糕。而且，他知道他的档案里有“社会关系”的纪录，他的单位知道他有一个妹妹在长沙，很快会有人追来，如果被他们抓回去，原有的罪名加上新的“逃跑”罪，他只会吃更大的苦头。因此，他不能在长沙久留，必须赶快离开。

他的外甥女，娄瘦萍的女儿，要跟舅舅同行。开始他们可能只想避一避风头，但是实际上当时无处可躲，后来他们决定设法离开中国，事实上，这是逃离文革迫害的唯一的出路。

娄瘦萍的女儿叫娄玉方，当时是长沙第四中学的初中学生。她和舅舅先到了广州，后来到了东北。他们到过北朝鲜，被遣送回来，然后，他们在东北的营盘被逮捕。他们的罪名是“叛国投敌”。由此罪名，韩国远被判处死刑，娄玉方被判10年徒刑。

仅仅因为试图逃离文革逃离中国，就被判处死刑！文革中有一批人因此罪名被枪杀，比如，“网上文革纪念园”中的顾文选。把试图逃离的人判处死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残忍的死刑标准。在奴隶制度下，逃亡也不至于被杀害，奴隶主需要奴隶作为劳动力，中国的文革领导人控制了八亿人口，不在乎这些人口的死活，他们要的是无边的威慑力、无上权威的巩固，顺着他们的思路，则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作。对试图逃离中国的人施加死刑，对他们的“革命”非常有利。当时，举国上下，残忍的迫害到处进行，不但手段残酷，而且打击的对象也越来越多，在迫害面前，如果不能忍受，人们只有两种选择：反抗或者逃亡。

然而，当时有严格的户口制度、各个单位和居民区的严格的监视系统，加上粮票发放方面的控制、每家住房的狭小、残酷的株连制度，这些使得人们很难帮助别人躲藏。因此，躲在国内的某个地方以逃避殴打和虐待，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想逃离文革的迫害，唯一的出路是逃离中国。

试想一下，如果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境，文革根本不可能进行。对文革领导人来说，封锁国境，不准任何人离开，是保护文革得以进行的必要手段。他们的设计相当清楚：铸造一个铁笼子，在这铁笼子里他们可以肆意虐待迫害人们。在一个开放的国度里，不可能实行文革的残酷迫害。正因为这样，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隔绝，对任何试图逃离中国的人的惩罚，在文革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

中国的普通人民，没有权利选举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也没有权利选择工作和居住地，当打骂杀戮袭来的时候，他们没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他们不但不能反抗，而且，也不能逃离。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个境况。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在前东德，如果试图偷越柏林墙而被逮捕，不会被判处死刑；偷越柏林墙被抓的人，判处的监禁是一年左右；现在人们知道，为了偷越柏林墙，有多少人被哨兵打死，有多少人进了监狱，但是关于有多少中国人因为试图离开中国而死亡，我们至今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中国文革当局要残忍得多。长久的超常残忍使得人们习惯了残忍，以致很多人以为枪毙偷越国境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韩国远被判死刑，不到18岁的娄玉方被判10年。没有离开家一步的娄瘦萍，也立即被逮捕，关入监狱，他在1968年被逮捕，在拘留所中关押了两年之后，1970年9月27日，他被判刑15年，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而他的“现行反革命罪”的具体内容，是帮助韩国远和娄玉方“叛国投敌”。

1970年，正是所谓“一打三反”运动的时候。这个缩略语中的“一打”是指“打击反革命”，在中共中央文件指导下，在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地抓捕了大量的“反革命”；新的逮捕人和审判人的方式也在那时被确立；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被下放到各省“革命委员会”，最高法院不再存在。文革后的一个“内部文件”说，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一百八十四万多名，逮捕了二十八万四千八百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至于确定“反革命”的“依据”，在笔者找到的当时的权力当局发出的关于被判死刑者的材料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被判死刑和重刑的人，最主要的罪状就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叛国投敌”这两项。

#### ◇ 马思聪的逃亡与周恩来的虚伪

在文革中因受迫害偷越国境成功者，现在我们知道的只有音乐家马思聪，文革前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和所有的学校负责人以及大批教员一样，马思聪1966年夏天遭到残酷“斗争”，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在校园“劳改队”中“劳改”，被抄家、殴打、关押。他在1967年1月16日偷渡香港成功，后来又被接到美国，他在美国得到政治庇护，居住在费城，1987年在费城去世。

在马思聪逃离中国之后，文革当局立即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追查行动。当局把严厉追查此事的信息传达到每一个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不仅是为了广泛动员追究那些同情、帮助过马思聪的人，从此断绝各种可能的外逃管道，也为了制造心理压力，断绝其他人萌生此心。

据上海作家叶永烈所写的《马思聪传》（笔者手头有台北版本，晓园出版社，1989）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1971年7月访问中国后，在美国的记者招待会上，基辛格说他会见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恩来曾经向他询问当时居住在费城的马思聪的情况。周恩来说：“我生平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

周恩来的这段话，也被叶永烈放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周恩来的这段话，是对美国人说的，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公布过。他对中国人讲话，跟他对美国人讲话，采用不同的口气和方式，是常有的事情，这其实不足以表明周恩来在中国实行的政策。现在叶永烈引用这段话并且放在扉页上，是为了强调周恩来和马思聪的关系以及周恩来对马思聪的“关怀爱护”。叶永烈也在书中紧接着写道：“马思聪曾经说过：‘我毕生最为敬重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总理。’”（页11）叶永烈为周恩来的这段话感动，并且也要读者作如是想。如果只了解马思聪一个人的逃亡故事，也许读者会相信叶永烈的话。但是，稍微贴近一点文革现实，了解一下别的试图逃离中国的人受到的惩罚，比如，这里记述的韩国远的死刑和娄瘦萍娄玉方父女被判重刑的历史，就会恍然大悟周恩来这段话是多么虚伪，多么不真实。

马思聪逃到美国，已经是中国权力当局无法干预的地方，所以在外交场合，周说一些似乎有人情味的话来评论，而且也绝不会让普通中国人听到。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对于那些逃亡未能成功的人，他们被抓住，遭到的处罚是死刑、被枪毙，最轻的也是十年以上的重刑。全国各省都是这样的判决，可见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实行的。如果周恩来真为马思聪五十多岁出走异国感到“遗憾”，对那些被枪毙的人们他要说什么呢？文革迫害死了那么多人，他遗憾的事情怎么能只有两件呢？我们知道，就在周恩来说这番对马思聪出走感到“遗憾”的话的



时候，曾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待过逃亡的马思聪的几个人，都还被关在监狱里，娄瘦萍父女这样的人，也还在劳改营中服刑。在马思聪出逃20年之后，这样的话被作为周恩来的“美德”来宣扬，对不明历史真相的读者，是一种明知故犯的误导。

1970年9月27日娄瘦萍被判刑的时候，在长沙开了全市性万人“公审大会”。这种“公审大会”也是文革中大量采用的最具文革特色的东西之一。这种“公审”没有证据提供。没有辩护，也不说出根据那一项法律条款定刑，在几千几万人面前进行，最主要的功用之一是恐吓民众，杀一儆百；“公审大会”之后，还把被判的押在卡车上到城里各处“游街”，威吓更多的人。娄瘦萍被押在卡车上，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的是“现行反革命份子”。他的家人不被准许参加那天的“公审大会”，他们打听到了“游街”路线，等候在长沙黄兴路的新华书店门口，当“游街”的卡车在公审大会后开过那里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娄瘦萍。这是他的家人最后一次看到他。

娄瘦萍被判刑之后，押送到位于湖南湖北交接处的涪澹农场，那是一个劳改农场，当时娄瘦萍已是66岁的老人。劳改营不给“犯人”吃饱饭，强迫他们作超强度的体力劳动，这不但不是秘密，其实也让“劳改”成为对牢里牢外的人进行威慑的公开手段，只是这种手段至今还未得到详细的记述和分析。娄瘦萍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了近四年，终于死在劳改营中。知道一些他在劳改营中的生活，并且见证了他的死亡的，是与他在那里相识的同是囚犯的那个“江雁”。

关于娄瘦萍在劳改营遭遇，请看“江雁”的文章，只是“江雁”在劳改营不可能和他多谈话，两件事情写得不够准确：

- 1、娄瘦萍的妻弟韩国远是被枪毙的，而不是被判刑十年；
- 2、随韩国远出走的娄玉方不是娄瘦萍的独生女，她是娄家长女，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

娄瘦萍被抓进监狱以后，他们家人失去生活的经济来源，他的妻子没有工作，四个孩子中，长女娄玉方也被判了刑关在劳改营，另外三个孩子都未成年，文革中也无处可以打工挣钱，所有打工挣钱的方式都被视为“资本主义”而禁止。娄瘦萍的家人不但作为“反革命家属”处处受到歧视，而且在经济上度日极其艰难，他的家人曾经一连三个月，没有买过一点菜，连两分钱一斤的空心菜也没钱去买。

在劳改营里，被囚者每个月可以发到1元5角零用钱，这是被囚者在伙食之外可以得到的唯一的生活资料来源，这钱在理论上说是给被囚者买肥皂和烟草等用的，但是因为劳改营中伙食品质低，量又不够，劳动强度非常大，被囚者长期处在吃不饱的状态中，他们往往把这一点钱，全部用来买食品，填补肚子。也有一些人比较运气，他们在监狱外的亲属会给他们送一些食品或者送一些钱来，这样他们可以略微改善一点生活。但是娄瘦萍不但没有人能接济他，反而是他把自己的每月1元5角钱，省下来，寄给他家中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

娄瘦萍最小的女儿是1960年代初期出生的，爸爸被逮捕的时候她还不记事，作为“反革命的女儿”，她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在心理和营养方面都处于恶劣的环境中，遭到打骂是常有的事情。家中无钱买食品，她长期精神压抑，营养不良，个子非常矮小，只长到一米四十多。最后，这个小女儿精神失常，自杀。

娄瘦萍的大女儿娄玉方被判刑的时候，还不满18岁。她被判刑10年，关在湖南茶陵的“劳改农场”，十年后刑满释放。文革结束后，她在医学院当清洁工。她刻苦自学，终于考上了医学院的研究生，在1990年代毕业，现在她是长沙第四医院的针灸医生。

我希望将来能够访问娄玉方，听她自己说出她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是不应该忘记的。这样的故事让我们认识人世，看到人间可能发生多么不合理、多么不公道的事情，世界上有一种邪恶的势力，总是致力于迫害人压抑人，这种邪恶在文革时代大行其道，毁坏了无数人的生活。娄玉方的故事也会是对人生力量的一种激励，让我们看到，在一个比较平和的时代，人只要努力，就可以创造比较好的生活。读者中有认识娄玉方的人，请把我的这一希望转告她。

我的更大的希望是，将有一天，人们可以自由地书写文革历史。我们已经无法改变过去，我们再也无法使文革的受难者们复生，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把他们的故事全都书写出来，并且理直气壮地宣告：害死他们是一种罪恶。我们可以大声地说出真实的历史，说出我们自己的和别人所遭受的迫害，说出我们的肉体 and 灵魂经历的痛苦，不需要隐名埋姓，临时另取一个名字，不需要惧怕作恶者的威胁。让我们为此努力。

~~~~~

【劫后反思】

我们敢不敢直面历史

• 徐友渔 •

有人说，我们青春无悔；有人说，我们劫后辉煌；有人说，我们是苦难与风流的一代。我要问，这一代人敢不敢正视自己的经历与良心？

三十年前，近千万学生青年自称为（或被封为）红卫兵革命闯将，使神州大地燃起遍地烽烟，把锦绣山河搅得天翻地覆。在他们当仁不让地准备分享改朝换代的胜利果实时，最高领袖发话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他们灰头土脸地退下政治舞台，从此去品尝人生百味。二十多年后，社会上又出现了他们的声音，这声音现在强到任何人都不能装作听而不闻。这一次不是以前那种冲锋陷阵的呐喊，而是对昔日辉煌一往情深的追忆，也夹杂着命运多舛的哀怨，以及对下辈今不如昔表现的愤言。

我首先要亮明自己的身份：我是这千万人中的一员，我有这一代人的自豪，这一代人的悔恨，这一代人不甘寂寞的禀性，这一代人仍想握住历史的野心，但我想强调，我更愿作这代人作得远远不够的反思。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日，对于战败国的反省，我们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刺激，我们的情感爱憎分明。德国总理勃兰特以无罪之躯，慨然下跪于华沙死难者纪念碑前，此举赢得我们由衷的赞佩。而东邻某些人的抵赖、强辩、推倭，令人鄙恶交加、义愤填膺。今年的“二战”纪念时时使我产生联想，当年以大字报的揭发批判伤害过教师、校长心灵，以拳打脚踢虐待过“牛鬼蛇神”，唾骂过“黑五类”同学，批判过“走资派”的人，有多少向自己的受害者表示过悔恨及歉意？1966年夏季，中国各大城市被“红色恐怖”的风暴席卷，不少人被“打死活该”，更多的人被驱逐出城，当年干这些事的人，有多少后来关心过这些人的下落，去寻访屈死者的遗嘱，力所能及地作点减轻罪愆之事？

我曾把红卫兵运动比作青年纳粹运动，这引起了愤慨和抗议，我现在并不想把当年犯了过失的红卫兵和战争罪犯相提并论。但是，既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又不会被索赔巨款，仅仅为了减轻一点内疚，仅仅为了使当年蒙冤受屈的人到头来感到世间毕竟还有正义良知，当年作过恶或犯有过失的人作点表示有什么不可以？

也许有人说，真正该负责任的人并没有得到惩处，凭什么追究我们这些“小萝卜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如果历史公正，终将会将元凶大恶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我说的不是历史或法律责任，而是每个人的道义感。

也许有人会说，我在“文革”中做过错事、傻事，但我遭的罪更甚。确实，“文革”始终是借用一批，打击一批，几乎没有始终如一的依靠对象，几乎人人都受害，个个一肚子苦水。但我们的记忆。我们的话语如此有选择性，这种选择的隐扬匿显的方向如此高度一致，岂不太奇怪了？再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日本人不谈珍珠港和南京大屠杀，只谈广岛和长崎，我们是否就认为他们没有战争责任了呢？

我的同龄人中，有不少现在是社会栋梁，乃至精神导师，当他们坐在主席台上，亮相于电视节目中，接受荣誉称号和颁奖时，他们是否会想到自己年轻时的鲁莽、无知和过失呢？

我不想故作惊人之语，把每个人都说成有这样那样的污点，我相信，许多人确实清白，也有许多人没有资格作恶。但我认为每个人，至少是那些在社会上吵吵嚷嚷的人，有责任如实地反映那个时代，自己在那个时代的所作所为。当我们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浩劫之后如何辉煌、自己既苦难又风流的故事时，也应顾及千百万被貶误终生的同龄人的情绪，也要计算一下整个民族付出的代价，尽管那场灾难在客观上既磨炼了也成全了自己。

我在研究“文革”和红卫兵，我想与同龄的一代人共同努力，以我们的回忆和反省，拼构复原那一段历史，这是改变了千百万人命运的历史，是改变了共和国发展方向的历史。我在一些大城市探寻采访，曾受到热情而真诚的接待，听到不少闻所未闻的故事，结交了一批朋友。但使我不安和忧虑的是，我感到这一代人中不少人正在有意无意地遗忘过去，有的是全面遗忘，有的是有选择地遗忘。我也仔细聆听社会上这一代中某些人的喧哗声，但我听到的多半是虚饰浮夸之言，我往往不得不承认其他人——上一代及下一代，尤其是下一代——的不以为然和不耐烦是合理的。我深知许多人的愤懑，时代剥夺了我们应该享有的东西，弟妹一代不但不理解我们，而且挖苦嘲讽我们。问题是，如果你至今不明白时代如何坑害了你，如果你讲不出多少有意思的故事，那不活该受误解，被可怜么？

有人保持沉默，既是无奈，也是高傲的沉默。他们曾经叱咤风云，指挥过千军万马，与毛泽东握过手，或与周恩来合过影，与军区司令员谋划于密室，部长和省委书记对他们点头哈腰。自己当年的喽罗现在当了总经理，当年以瞻仰自己风采为荣的“红小兵”现在当了博士出了国，他们内心很不平衡，表现出来却是鄙夷不屑。他们一举手一抬脚都要呼风唤雨，一开口就要惊世骇俗。他们绝口不谈过去，等待着有一天一鸣惊人，或者坚信历史自有公论，后世会给他们一个公道的说法。这些人决非庸碌之辈，我永远不敢小看他们，但公正的历史就是重现当年的光彩么？他们倒没有丧失记忆，记忆是他们生活和心理的支撑，但这种记忆是一种精神性的化石，它不随时代变迁和反思而改变，它拒绝参与公共话语。我敢断定，私人记忆，不论多么顽强也不会变成历史，就如当年不是个人的意识，而是集体的意识及无意识才是运动的潜流一样。我不相信，正确的历史只能等待某些风云人物有朝一日给我们端出来，我认为，它有待我们——不只是这一代人——共同发掘、交流与探讨。

有人说，这一代人的遭遇和历史，要五十年之后才说得清楚。这话有一半是对的，没有时间距离就谈不上历史，看看现在大多数当事人还没有跳出个人地位和派别偏见的回忆和评论，就知道现在拿出来的东西一定只能是半生不熟的议论和片面狭隘的印象。但是，没有半生不熟的东西，成熟的东西从何而来？如果记忆在我们这一代中断，我们期望下一代怎么学历史？最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我们能把责任给下一代吗？

我曾陪一个朋友去拜访他父亲的老友，那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有才气的诗人，他们同属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主人家中的气氛纯洁和凄凉得令人心碎，他们大半生被摧残，许多家庭破裂了，子女们疯的疯，病的病。我和主人的对话使我终生难忘。他极其伤心地告诉我，经常有年轻人听说他们曾是“胡风分子”，就不假思索地说：“啊，反革命！”原因很简单，当初的定性，八十年代初给他们平反的通知，并非人人知晓。社会上的种种传言，包括同情的文章，不是令人不满意，就是给人伤害。我问：“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如实写出这段历史？”他吃了一惊，似乎从未想过可以这么干。他非常痛切地反复表示，希望我们了解真相。理解他们。我当时真想对他大吼：“你不告诉我们真相，我们怎么理解？你们逃避责任，对我们不了解你们有什么可抱怨的？”望着善良软弱的、似乎已近风烛残年的老人，我没有作声。我的那位朋友很爱他的父亲，他是“胡风后代”中仅有（或少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我问过他几次，为什么不全力以赴反映父辈的遭遇和不幸。他说，他本人有太多的痛苦和不幸需要表达。我不认为他的遭遇可以和“胡风集团”相比，但我想他是正确的，一代人的历史，只能靠自己写，不能指望别人帮忙。

中国的历史太悠久、太丰富了，因此我们对历史熟视无睹、没有感情。我希望，我们这代人能激活自己的记忆，趁为时不算太晚抢救一代人的记忆。什么是历史？无情无私的记忆，加上敢于拷问灵魂的反省。

□ 原载《青年报刊世界》1995年第4期

~~~~~

#### 【劫后反思】

### 博物馆与真实记忆

• 徐友渔 •

人有一种奇怪的天性：对自己的记忆有极强的选择性，记住愉快的时光、光荣的业绩，淡忘不愉快和令人难堪的过去。如果有一段岁月不那么光明，那么人们往往抗拒记忆，拒绝一切引起记忆的提示，或者在不得不面对过去时挑选那些令自己心安理得的东西。博物馆对人的这种心理出了一道难题。

前不久一位朋友告诉我，“文革”博物馆将在上海动土兴建。我不相信这个消息，因为自从巴金老人提出建“文革”博物馆倡议之后，十多年过去了，尽管响应者甚众，且其言其情至为哀切，但看不出有实现这个倡议的可能。我翻了一些报纸，托上海的朋友打听，未能证实这个消息。朋友又告诉我，他是从电台听一则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区建设规划的报导中知道此事的，我想，这不会是小道消息了。

“文革”博物馆终于要建了，终于！我们会不会高兴得太早呢？取消一项尚无蓝图的计划，不是很容易么？即令修建了一座博物馆，将它改作它用，不也是很容易么？我担忧的不是这些，我的忧虑可能是人们不太容易想到的：我们会有一座什么样的“文革”博物馆，它将告诉人们，告诉我们的后代什么事？

我的同胞中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当巴金修建“文革”博物馆的倡议遭到冷遇和抑制时，海外一些“文革”的专门研究者也不赞成现在就建博物馆。他们和“文革”毫无干系，他们对“文革”极端否定。他们反对的理由是，当人们并未完全走出“文革”话语时，这样的博物馆不能让人正确地了解和认识“文革”，吸取经验教训。不能说这种见解过于挑剔与偏执，连“四人帮”都抓了，对“文革”的否定不算不彻底了吧，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不是又讲了很久么？

我仍然主张尽快建“文革”博物馆，要彻底摆脱“文革”话语，一时半载根本做不到。现在已经有人开始杜撰“文革”的神话，时过境迁，人们得到的“文革”历史可能不是越来越真实，而是越发令人啼笑皆非。

中国人大多不愿直面人间悲剧，对于那一场浩劫的种种描述：批斗会、牛棚、抄家、武斗，已经有人表示不耐烦，当成絮叨和老生常谈。中国人有太多的英雄崇拜和浪漫情怀，现在的“摸着石头过河”，似乎不如“文革”时那种独树一帜、力挽狂澜、高瞻远瞩、势如破竹、天下大乱、“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气磅礴激动人心。中国人永远想化腐朽为神奇，现在搞经济建设、科技兴国，似乎正是在走西方国家的老路，有人开始焦急，如此这般下去，中国何时能出人头地？遥想“文革”，我们敢于反世界进步常规的潮流，虽是孤家寡人，但有一腔“浑身是胆雄赳赳”的豪气，他们认为，“文革”不过是在方法上不对，而精神却十分可贵。

我希望，我们的“文革”博物馆能大致反映“文革”的本来面目，告诉人们事实真相，打破某些当事人加给它的光环，防止后来者对它的理想化和神化。

其实，在我看来，“文革”博物馆能建也罢，不能建也罢，并不是那么重要。建与不建，都各有利弊，关键是它应该不仅建于计划中的上海浦东开发区，而且建在中国每个“文革”亲历者、建在中国世代人的心上。认真说来，博物馆的作用相当有限，而且常常给人以误导。著名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最近专为中国读者写了一篇文章，叫《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她说，博物馆往往是建造者旨趣的公园，不论摆设多少实物，以求再现历史，也无法表达受难者刻骨铭心的感受，这种个人记忆、私人体验，本来就不可能在公共话语空间找到自己的位置。虽说博物馆的功能有限，但一旦要建，人们还是有理由对它提出一些基本要求。作为一名“文革”的研究者，我对拟建中的博物馆有以下期望。

第一，它要全面描述事实真相。

经常从书上读到，在英美法庭上宣誓作证时说的话是：“我将说真话，而且说出一切真话。”实践前半句不难，而兑现后半句则不易。歪曲历史最聪明的办法并不是公然扯谎，因为那很容易被揭穿，弄巧成拙，而是说部份真话，让人以为那就是全部历史。可以设想，如果日本的靖国神社供奉的一位阵亡军官确实作战英勇，舍己救人，我们能满意关于他的真实故事么？舒衡哲在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指出，博物馆喜欢描述“令人安慰的真相”，这对中国人尤其如此。这些令人安慰的真相不论积砌多少，都拼构不成真实的历史。

第二，它要触及人的灵魂，激发人们在道德上的思考和反省，而不要把任何过失都归结为认识的错误或局限性。

“文革”中最流行的口号之一是“受蒙蔽无罪”，“文革”后最普遍的态度之一是，认识错误是不受谴责的。很令人奇怪的是，发生了那么多惨无人道的事，几乎没有人提出道德过失的问题。把校长、老师、同学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横飞，难道只是一种认识错误？就算误把他们当成了“走资派”、“阶级敌人”、“牛鬼蛇神”，也得不出结论说，暴行是正常的。动手打人，难道果真没有一点私心，比如图报复，或者要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立场坚定”？本文被采访者反思得很诚恳：明明知道受自己尊崇的老师不是坏人，但施暴时不敢挺身而出，因为怕别人怀疑自己的立场。这就是怯懦，这就是自私，敢这么给自己下结论的人有多少？与自己共事几十年，政治审查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突然间人家成了叛徒、特务、国民党，自己安之若素地相信，难道只是被“防修反修”的理论迷住了心窍，难道除了这点小小的认识错误，心灵如水晶般纯

洁、透明，没有一星半点野心、权力欲、落井下石的晦暗心理随德反省并非万能，但逃避道德责任，把灵魂里三层外三层包裹起来，除了自欺和欺人，还能是什么呢？

第三，它应避免摩尼教式的世界观，即时时、处处用光明与黑暗、善与恶、好人与坏人的截然对立的观点来描述和解释那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悲剧。

从法律上说，可以挑出和审判“文革”的一小撮罪犯，但就社会责任和道义责任而言，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纯粹的施虐者，纯粹的罪人和无辜者。当然，这是在一种很根本和间接的意义上说的。比如，那么多学生打老师，难道与“文革”前老师们讲述的阶级斗争神话，培育的那种“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无关？“文革”中不少文化名人含冤惨死，其情之哀，其状之惨，难于描述，但翻翻历史，在打击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在“反右”斗争中，这些德高望重的人物不是也对同样无辜、同样有名望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无情揭露、大肆批判吗？所谓蒙冤受屈，说白了就是受到不公正、不实事求是的对待，但人们是否可以反躬自问，自己在蒙难之前难道不是这么对待过别人，并以自己的行为营造了一种不顾事实、不讲道理的气氛？

不论怎么说，如果“文革”博物馆能建立，它应该是一件好事，尽管它只能反映我们这代人很不全面、很不深刻的反思，尽管它不可避免地会夸大某些并不重要的东西，藏匿某些有意义的事情。但“文革”博物馆的建立，毕竟是一个象征，说明这个民族有勇气面对自己历史上的惨痛和耻辱的一页，说明它愿以一种物化的记忆，警醒自己，警醒世界各国人民，告诉人们，当一个民族丧失理智，与人类文明的通途正道背道而驰时，会发生多么荒唐、多么可怕的事。

但愿“文革”博物馆不要成为上海滩上的一景，但愿商品潮和世俗文化的气息不会侵扰这个庄严肃穆的地方，但愿人们不要在赴酒宴和唱卡拉OK的间隙拨冗到此匆匆一游，但愿参观者能在这里上人生一课，更深入地思考历史、未来、人类、良知。

□ 原载《青年报刊世界》1996年第1期

~~~~~

【研究动态】

社会史视野下的“文革”研究 ——徐有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简介

• 董国强 •

长期以来，国内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下的“文革”史研究，一直遵循着“路线斗争”的理论模式。在这个理论模式之下，研究者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这实际上反映了人们思想观念深处的一种潜在的、变态了的“英雄史观”。现在看来，这种基于传统史学研究理念的对“文革”的观察和叙述，远远不足以反映“文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全貌，尤其无助于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普通民众在运动初期积极投身于其中的事实。

徐有渔先生的新著《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独辟蹊径，采用社会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借助“社会冲突理论”模式，为我们揭示了关于“文革”的另一幅更为广泛的社会图景，读来令人耳目一新。笔者长期以来郁积于胸的一些疑问，也在读完该书以后迎刃而解。

这里有必要说明，运用“社会冲突理论”模式考察和解释“文革”，并不自徐有渔先生始。早在1970年代，美国学者陈佩华、骆思典、李鸿永等就已经对此进行了尝试，并因此奠定了他们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但在笔者看来，他们的研究成果，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采样样本地域的局限（主要是广州地区）和样本容量的局限等问题。这样，在有限的范围以内，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成立的，富有启发意义的，但是当他们试图用这种区域研究的结论去诠释整个红卫兵运动的时候，就显得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说了。

《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写作于1992——1996年间，1999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与陈佩华、骆思典和李鸿永等人相比较，徐有渔先生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优势：

首先，在写作《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的过程中，徐有渔先生有意识、有计划地采访了100多位当年的红卫兵。采访对象的选择考虑到了（一）地域的广泛性、（二）年龄层次的代表性和（三）组织派别的代表性。这就使得他的研究采样不仅具有典型意义，而且具有更多的包容性。

其次，徐有渔先生早年曾经亲身经历红卫兵造反运动。他是四川红卫兵组织的核心人物。因此，他对于红卫兵内部的社会成员结构、组织原则和运作程序了如指掌，同时对于红卫兵在造反运动中的心路历程有深刻的体验。

第三，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文革”运动的亲历者，徐有渔先生对于“文革”期间一些重要历史文献（包括官方的和民间的）出台的背景情况更加了解。这也是外国人或年轻一代学者无法比拟的一个优势。

以上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本书成功的基础。

当然，《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的成功，最重要的，还应归功于作者对“社会冲突理论”的深刻理解和熟练运用。

笔者认为：运用“社会冲突理论”解释“文革”，一个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无情揭穿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温柔面纱。“文革”前十七年间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和矛盾冲突的许多事实，在这类研究作品中表露无遗。这极大地有助于我们理解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积极投身“文革”运动的社会动因。相形之下，“路线斗争”理论模式对于群众运动成因的那种简单化约的解释（如狂热的个人崇拜和盲目迷信等），显得尤其苍白和片面。

其次，运用“社会冲突理论”模式深入地研究红卫兵运动，必然涉及到“文革”期间的若干“异端”思潮。这是目前国内“文革”史研究主流话语中又一个被小心回避的话题。现在看来，所谓“异端”思潮，实际上反映着当时中国社会内部不同利益群体、阶层对“文革”的不同态度和预期。从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清晰地看出，对所谓“异端”思潮的镇压，特别是对所谓“极左”思潮（如“四·三派”和湖南“省无联”的“极左”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部份社会公众对最高领导层发动“文革”动机的善意的理解。他们要求将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阶层”的革命进行到底。）的镇压，反映出“文革”发动者和普通民众在“革命”动机和利益分配问题上的尖锐对立，同时表明了“文革”发动者的政治保守倾向。由此看来，近来一些“新左派”同人试图将“文革”群众运动归结于“文革”发动者的主观善意和先见之明，而忽略了底层群众运动的深刻的社会根源，以及“文革”发动者和各群众组织之间始终存在着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从而美化“文革”发动者，混淆“两个文革”的不同属性，显然是有违历史的真实的。

《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是作者长期从事“文革”研究的一个系统化的理论结晶，包含许多精彩的论述和极富启发性的观点，笔者在此无法一一列举。总之，笔者认为，该书是目前国内学者运用西方现代学术理念研究和叙述中国问题的一个成功典范，值得我们大力推广和借鉴。

如果我们把该书和作者的《自由的言说》、凌耿的《天仇》和其他一些“文革”群众运动亲历者的有关著述结合起来阅读，可能会对上述的说明有更深刻的理解。

~~~~~

## 【研究动态】

### 读徐友渔文革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

• 胡 平 •

文化大革命距今已有三十多年了，但出自国人之手的对文革的研究著作仍不多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大陆学者徐友渔写的《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称得上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文革研究专著

徐友渔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是著名的西方语言哲学专家，同时也是文革研究专家。《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是他用了四年时间（从1992年到1996年）完成的。为了写作这本书，作者采访了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一百多位前红卫兵，阅读了文革期间各种出版物，研究了西方学者的有关论著，和国内外研究文革的学者进行了交流切磋，并发表了论文若干篇作为本书的前期准备，再加上作者本人当年就是红卫兵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思考者，并且具有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深厚素养，所以，《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不论是在对有关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的通体把握上，还是在对文革运动的切身感受上，以及在对复杂事件的综合与分析能力上，都达到了第一流的水平。

《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全书共314页。内容分为六章：一、导论：目的、方法、主要结论，二、文革前的教育、意识形态和政治歧视，三、红卫兵的区别和派别，四、造反的原因，五、幻灭和觉醒，六、后果。

作者通过对红卫兵精神素质的研究，揭示出红卫兵运动的种种特点，例如造反的行动模式、派系形成和地区差异，以及红卫兵思想的类型和文革前后变迁的趋势等等。作者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红卫兵在文革中似乎不可理喻的造反行为，具有规律性的派别划分和派别斗争，是文革前官方意识形态灌输，毛泽东在文革中巧妙地施展策略手段，以及当时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中业已存在的矛盾爆发这三方面因素相结合而发挥作用的结果；文革导致了与其发动者初衷相反的结果，红卫兵不但没有在斗争中锻炼成为“防修反修”的一代新人，反而由于对政治欺骗和利用的反感与原有的革命意识形态的疏离，其中善于思考的一些人开始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中真正存在的问题，成为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的新生力量。

《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材料充实，叙述完整，分析深入，议论精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作者提出的观点不仅不同于中共官方的见解，也和民间的或西方学者的流行观点不一样，显示出作者独到的真知灼见。

不妨举个例子。众所周知，在文革中，群众分别参加了不同的政治派别，有些当了保守派，有些当了造反派，而那些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或其他原因在文革前受到政治歧视的群众多半属于



造反派一方。对于这个事实，一般人的解释是，因为文革中的造反是造文革前十七年的反，是造原有体制的反，所以那些在过去受压抑的群众自然就会选择造反派。徐友渔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指出，出身不好一类群众之所以加入造反行列，与其说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由于运动的进程，他们被选择的结果。作者写到：“运动开始时，人们出于惯性相信和拥护党组织，保守的人居多，造反的人很少，出身非红五类的学生大都持保守立场。他们之所以没有当保守派，是因为血统论泛滥，人家不要他们革命，他们想当不上！由于受到红五类的压制，他们产生了怨气，当1966年10月之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有资格参加或自组革命队伍时，保守派已经式微，他们自然就参加了造反派。”认真回顾文革的过程，相信大多数读者都会接受作者的观点。

文化革命和尔后的民主运动有什么关系？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针对有些人把文革认作民主运动，把文革中的“四大”理解为真正的自由以及把毛泽东反官僚特权的理论认作是争自由争民主的思想武器一类观点，徐友渔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辨析与反驳。但他同时又指出，文革与民主运动存在着一种间接的、复杂的、曲折的联系。准确的说，民运是文革的副产品。作者还从多种角度，对文革究竟在哪些意义上促进了民主运动提供了若干富于启发性的说明。

和徐友渔的其他著述一样，《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语言清晰，逻辑严谨，作者从不故作惊人之语，因文害义，而是从容地展开平实中肯的论述。这种风格也是我深为赞赏的。

我和徐友渔是老朋友。文革爆发时，我在成都十九中，他在成都一中，都是高三学生。1967年三月，我和同学们创办了一份铅印小报，转载了北京《中学文革报》遇罗克的一篇批判血统论的文章，通过这份小报结识了徐友渔。后来成都造反派打内战爆发武斗，我和徐友渔虽然分属对立的派别（我是八二六派，他是红成派），但我们都反对武斗，主张联合。就在这时，我们又结识了在成都九中的高三同学张隆溪，他是九中造反派的一个头头，也是在运动初期就积极批判血统论的，这时他正在邀集志同道合的各方人士大力呼吁两派联合。文革结束后，我们三人都下乡插队。文革结束后，我们都考进北京当上研究生。我和徐友渔的专业方向都是西方哲学，而且都是对西方哲学中的经验主义传统最感兴趣，这在同代人中是不多见的。三十多年过去了，徐友渔和张隆溪都在学术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如今，徐友渔完成了这样一部出色的文革研究专著，我身为老友，也与有荣焉。

~~~~~  
【往事追忆】

红卫兵小报和我（十一）

• 周孜仁 •

十三，陷入动荡的重大校园

一月夺权，在全国范围内把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势力翦除得差不多了。接下来，林彪当然想乘胜追击，把军内异己一鼓荡平。江青一伙居间凑趣，也是想借林的力量将他们看不顺眼的老干部（不仅地方、也包括军队的）统统打倒。毛泽东虽然孤注一掷把刘少奇搞下去而将林推上“副统帅”位，虽然在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把打倒军队内的走资派确定为目标之一，但他又绝对不允许林彪为一己的山头放开手脚为所欲为，也绝对不允许江青一伙头脑发热、不讲策略地乱搞一气。在玩弄政治平衡方面，毛绝对是超一流的魔术大师。要在各派政治势力、各种利害中寻找平衡和控制平衡，他的态度总是高深莫测、忽阴忽晴，让人眼花缭乱，摸头不着脑。

如果这种分析不错，那么，1967年断断续续、绵延了几个月的所谓“揪军内一小撮”“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当是属于正宗左派观点：川大八二六，重庆反到底，算是得其真传。问题是，在重庆支左的军队54军，偏偏又是林彪麾下的主力战将，重大八一五死心踏地和他们站在一起，不能不说也得了护身咒符。重庆的两派于是难分真伪，斗起法来鱼龙互易，泥沙混杂，上天入地，难决高下，其源盖出于此。

下面继续说重庆的事情：

四月一日出版的第六期《山城战报》，以非常显眼的通栏标题刊登了“炮轰谭震林，粉碎新反扑”的文章，表示重庆市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紧跟中央开始动作了。只是，这篇长近一个整版的消息，仅仅像记流水帐一样，介绍了一番二月中旬发生在农业部的鸡毛蒜皮，在外间看来毫无引人入胜的故事性。中央高层到底发生了什么？毛、林、中央文革那几个不可一世的秀才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大家完全懵在鼓里。只不过为了表示自己大方向一贯正确，于是便稀里糊涂跟着起哄罢了。

815派、革联会及驻军对所谓反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解，可以从该期刊登的几篇文章看得出来。头版头条：“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公函（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公函重申了军队立场，大意如下：一，“原保守派组织的斗争大方向是错误的”，“是李井泉通过原市委一手炮制的”，“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二，“目前原保守组织中的某些少数人企图重新恢复组织，对此，我们是坚决不支持的”；三，“参加原保守组织中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四，“（原保守组织中）如有极少数别有用心分子继续玩火，那么矛盾就会转化。我们一定支持革命左派，粉碎资产阶级复辟的反动逆流”。此外，该期报纸还发表了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还有一篇本报观察员文章：“树欲静而风不止”，内容均大同小异。根据我自己作的记号，那篇社论当是我写的，现在重读，亦有不知所云之感，无非把已经垮台的、毫无还手之力的走资派、保守派再次威胁一通而已。只是有一段，作为作者，可能是专有所指。该段内容是：“有的革命小将，由于头脑中‘私’字作祟，在运动发展的关键时刻，被阶级敌人利用了，迷失了方向，犯了错误，对于这些革命小将，应当帮助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可是有的人却趁此机会摇身一变，以当然左派自居，不准他们革命，把这些革命小将一棒子打死。”这段话显然表述了我3月17日在北碚解放台看见831头目带铐示众时的想法。送审和出版后，编辑们对这些话有什么反应？现在已经想不起了。对于我个人，这些话，至少是久压难抑，不吐不快了。

在重庆大学的校园，这时已经是山雨已来风满楼。

下面是我的日记：

“3月31日。不平静的夜。同学们不顾总团某些人的阻拦，征集签名，准备次日大游行，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总团连夜召开小组长会，被迫上马。

“4月1日。压抑在同学们心中的全部激情统统爆发出来了，像火山的岩浆全部爆发出来了。/晨六时，紧急集合，召开全团大会。周家喻上台大放厥词，企图阻止游行，群众大造其反，然后，数千人浩浩荡荡进城，进行了爆发性的游行，震动甚大。

“4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发表，大大鼓舞了革命造反派，我们这一群为西师、交院早就抱不平的八一五，心里感到无限兴奋。

“4月4日。革联会召开了一个全市的不像样子的大会誓师向刘少奇开火。会上，我校打出大标语：‘警惕山城和平演变’‘打击革命小将就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联会必须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震动很大。在上清寺贴出了4.4大会质疑（革联会原拟定于四月四日举行全市的所谓‘工代会’——笔者注）的大字报和不准工纠挤进工代会的大标语。对于即将在旌旗招展的人民大礼堂召开的所谓工代会，同学们表示，若要召开的话就坚决造反。／人们在议论：重大八一五要反了。

“4月5日，革联会连夜召开常委会，决定无限期延期召开工代会。”

3月31日那个“不平静的夜”，同学们到底怎么不顾总团某些人的阻拦，征集签名的？而总团在连夜召开的小组长会上，是怎么被迫上马的？次日凌晨六时，天还很黑，我记得广播里号声响起，很紧张，像是有外敌突然入侵，全校同学惊诧地翻身起床，从四面八方赶到八一五广场（文革后改名为“思群广场”，以纪念文革初被市委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原校长郑思群——笔者注）集合：这时，周家喻上台怎样“大放厥词”？而群众又怎样大造其反？这些细节，一定充满了矛盾、困惑、苦闷和斗争，因此也一定充满了戏剧性。与总团其他勤务员相比，周家喻算不得老谋深算，而最多是个煽动家。读书时，他在业余体育队当羽毛球员，伶牙俐齿，多言善辩，精力极其充沛，满是“坏小子”的乐观、机敏、敢作敢为和恶作剧，在一哄而起的群众性动荡中，他这种性格很容易被人接受从而成为领袖。事实是，815总团的很多具体组织工作确实并非他做的，他就会煽动。1967年秋，重庆大学准备成立校革委会，全民投票，他的票数竟然排到了第十位！谁叫砸派老要批周家喻的“右倾”，要摸周家喻的“老虎屁股”呢？敌手的攻击成全了他。周家喻成了815的象征。1968年春两派在北京参加中央学习班，讨论领导班子组成人员，815的代表就公开宣称：周家喻就是个傻子，我们也要选他进省革委当副主任。这是后话。1967年4月1日那个春寒犹劲的凌晨，周家喻被大伙儿哄下讲台，那些细节一定也很精彩，可惜时间太久，我回忆了很久，问过好些同学，大家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四月初，西师831和交院915已经正式平反复出。重大815战士为此是付出了很大努力的，对它们的复出确也由衷地表示过祝贺。问题是：831们既然付出了比重大815造反更沉重的代价（他们的遭遇本身就构成了革联会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好注脚），在政治棋局上自然就拥有了更多的资本。这是一匹倔犟的烈马，原本就不愿被八一五套上笼头，现在自然更不可能充任驽马。政治博弈的规则往往如此：不作铁锤，就必须作铁砧。砸派既然不成附庸，自然应该成为主宰，应该由他们来号令天下。前面说过，西师831复出后的“严正声明”，从第一天的“重大815是坚强的革命左派，重大815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坚决和重大815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急转而为“重大815是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这个弯转得也实在太快了些，让当初为他们鸣不平的815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年轻人的虚荣心和自恋情结使他們要维护自己辛辛苦苦搞起来的815和革联会，而染尘甚少的正义感使他们又必须起而为确认的信念、为他们根本搞不清楚的最高统帅的意图去舍命抗争。重大815开始在两扇沉重的磨石之间痛苦地接受挤压。

我在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重庆乱了，一向称为铁板一块的重大815也乱了。／向谁决战呢？／重庆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在什么地方？／警备司令部有没有谭震林？该不该砸烂革联会把这个谭氏人物暴露出来？／重大815是不是被利用了……／一连串的问号，把勇敢的815战士的思想搅乱了……”

砸革联会的声音一天比一天高，而重大815呢？不知所措，沉默了。校园里已经出现了大标语：“坚决砸烂伪革联！”署名：“反到底”。有趣的是：当时砸派还没有确定这个名字呢，却被815自己先用上了。更有意思的是，标语竟是当初发起815事件的主力：业余文工团

的几个激进分子所写。作为组织，一个叫《偏在寒中俏》的战斗队从815内部冲出来了，成员是最早的造反分子、电机系的邹世友和吴贵伦。

四月六日日记：“然而，重大815没有说话。两种针锋相对的见解在重大815内部进行着激烈的辩论。一次，没有结果，又来一次，又没有结果。在总团的会议上，一次，没有结果，再开一次，也没有结果，再开，还是没有结果……/人们一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是砸还是轰？”

事实上担当着领头羊角色的重大815，他的沉默本身就意味着问题的严重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重大校园几乎就是重庆的政治大本营。上面一有风吹草动，八区三县的“革命群众”都喜欢到重大来找815讨教。先是去总团信访组，又由总团信访组介绍到各系各班的战斗组接待。我就曾经接待过文艺系统的几个人，并且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歌舞团的张运涛、越剧团的田会珍、话剧团的孟庆善、杂技团的郑洪等，一共八人。他们的神情、态度，很像在白区找到地下党组织一样兴奋，一个个都激动难已地争着说，抢着说，而出得重大校园，一律革命信心倍增。我还有个同学，因为接待重纺六厂的来访群众，和其中一位很漂亮的女工一见钟情，后来就爱得难分难解，死去活来，当然，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桩很失败的婚姻，我就不便在此披露他们的姓名了。重大八一五的沉默对于徘徊歧路的整个大派，无异于一场灾难。以至于其他的815战士已经无法忍受。有一个工人在重大校园贴了一张大字报，代表了八一五派共同的焦躁与不安。这是一首叫《呐喊之声》的诗歌，其时被很多同学传抄，我也把它抄在了笔记本上。下面仅录其中两段：

不要这样沉默，重大八一五
让雷霆喊出你胸中的愤怒
为什么万里之外对你缺席审判
为什么前后左右向你进攻
假如你胸中是一轮红日，
解开钮扣，把它托上解放碑峰

山城人民永远热爱你，重大八一五，
川江雄歌，决不做易水悲曲
谁个是红心赤胆照长空
谁个是沽名钓誉梦云楼
任它柳随风摆，帆听风说
还看今朝红岩，岂效渔家轻舟？

4月5日，建工学院818全团举行辩论会，率先统一了认识，确认818战旗永不倒！接着数千人浩浩荡荡来重庆大学声援游行。上一年的8月13日，重大造反派第一次冲出校门，就是到建工学院声援游行，那次行动成为了重庆文革爆发标志的815行动的预演。而现在，轮到对方来推动自己了。重大815还有什么可说呢？学生自发地一涌而出，和建院的队伍迅速汇集一起，又涌向师专。那是815事件的发源地。这次集合本身就有一种重新开始的意思。接着，三中、一中等校的“中八一五”也涌向师专。在当天日记上我这样写：“顿时，夜晚的815广场变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八个月前，就是在这个广场上，点起了重庆市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烽火，八个月后，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决战的前夜，又在这个广场上，响起了重庆市的第一声春雷。夜啊，不眠的春夜，沙坪坝在燃烧，山城在燃烧……”

但事情总不可能靠一次集会所煽动起来的激情就彻底解决。年轻的心是飘浮不定的云。今天吹东风，它向西边飘去，一会儿刮西风，它又会向东边飘去。而1967年春天的中国天空，

刮的全是乱七八糟的狂飙罡风呢！

在当时日记上我还记了这样一件事足以说明自己思想的混乱：一天晚上我回到学校，不是恶作剧，而是非常认真地“试着以砸派的观点与队上的同志辩论”，公然“我胜利了。”于是我兴冲冲地马上返回十多公里外的市区，和《山城战报》的编辑邓庆平一道去找到革联会主任刘润泉，准备和他也这么来一次模拟辩论。

刘润泉时任54军政治部副主任，东北人，个子矮而壮。后54军调防云南，他曾担任过昆明军区的政治部副主任。那时我也恰在云南省委办公厅任秘书，与他的接触就更多些。刘退休后移居广州军区干休所赋闲养老（他夫人是广东人），1990年，我到深圳经商，其时，我公司的助理、原四川外语学院815派一号头目的金光中专程去广州看他，回来曾对我这样说：他老多啦，看起来完全像一郊区菜农。但在我的印象中，他身上一直就好像看不出军人的威严，而更像一个慈眉善眼的和蔼老头。革联会期间，都在一个大院上班，随时能见到他。我记得每向他说到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说到由此而在社会、在815内部引起的种种混乱，他就只会叹气，反问我：我们该怎么办呢？事情都是你们搞起来的。我们解放军只是对你们支持，你们也闹，我们怎么办？他态度的真诚本身就够让人感动了，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我已经记不起那一晚我和他的谈话如何起？如何终？大约又是他的诚恳把我征服了。于是，我的日记上有了这么一段记录，说我和他交谈后“对革联会又做了重新估价。我有两点看法：1，革联会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这到底是由于谭氏人物造成？还是由于认识问题？到底能改？还是不能改？我的结论是后者。2，如何看待砸派？他们是真的掌握了大方向？还是出于复仇心理？是孤立地看待他们的行动？还是历史地、全部地分析他们的行动？结论仍然是后者。介于这两点，我认为革联会不能砸。”接下来，我写到：“深夜，又赶回学校，把同志们说服了。”事过几十年，如果要用一个词汇来形容当时我的行为状态，我想用这样四个字：“摇头苍蝇”。

驻军部队定然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4月8日这一天，54军副政委蓝亦农和副军长白斌决定亲自出马稳定军心。数辆军车将重大八一五的200余名战斗组长和建工学院的部份代表拉到了鹅岭公园下的警备司令部。会面是在一个小礼堂进行的。时间是下午，山城重庆的天色晦明不定。主席台上点一盏绿色的台灯，给人柔曼而平和之感。白先传达了刚结束不久的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精神，重点是林彪所谓“古今中外……影响一切的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和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胡诌。接着蓝就革联会、镇反等诸问题发表演讲。我记得他看资料时戴一付老花眼镜，说话轻声曼语，显得尤其亲切。质朴的工科大学生被军人的儒雅和真诚征服了。演讲人绝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讲话结束时，蓝已胜券在握，意味深长地对台下的年轻人说：“我们心中是有数的。正如俗话说：任凭风浪起——”话犹未了，台下马上齐声接茬：“稳坐钓鱼台！”这一天是周末，54军趁热打铁，当天晚上，马上又派刘润泉到重大召开会议“交底”，对八一五表示坚决支持。

毕竟保守派刚刚垮台不久，这些热爱党组织的乖宝宝们，他们和所谓“走资派”之间发生的所有悲喜剧815都记忆犹新。815们当然不愿意、甚至十分害怕自己一不小心便重蹈覆辙。因此，4月8日下午和晚上815与军人的会面，在重大校园，很快就被一些激进分子指责为“拉一派打一派的黑会”，“和当初李井泉和思想兵的黑会没有什么两样”。

只是，砸派的气焰日盛一日，革联会和重大815已经被他们奚落得一文不值。他们用各种方式来刺激815派脆弱的神经，他们把815骂为“叛徒集团”、“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被黑帮收买了”，用漫画将他们画为丑陋的“癞格宝”（重庆地方语，即“癞蛤蟆”——笔者注）。虚荣心和自恋情结使重大的学生们已别无选择。对方的轻慢欺辱逼得他们只能把自己的命

运紧紧捆在革联会的战车上。

4月9日，大田湾再度成为重庆所有眼球聚焦的舞台。815派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此召开大会，誓师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开火。蓝亦农再次到会演说。但效果显然和前一天警备区小礼堂的效果大不相同。大会的主旋律虽然还是“革联会好得很！”但杂音已经很多了。会间，工业校815派不听招呼的学生们爬到主席台前，大写其标语：“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中学91纵队干脆就多次冲击主席台。虽然造反未遂，但裂痕正式公开，八一五已经不再铁板一块。就在这个大会上，大家都不再迟疑地选定了自己的角色。该退场的，纷纷退场，要和革联会站在一起的，因叛逆分子的胡闹而铁了心，在会场上呆下来，偏偏把口号喊得震天价响。

从这一天起，重庆的政治格局重新明朗了。保卫革联会营垒里，重大815再度成为核心，也自然开始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未完待续）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吕青（加拿大） | 熊波（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